

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土地整治怎样实现跨地区调剂

■ 谷晓坤

2010年以来,上海立足大都市经济社会和土地利用特征,通过郊野公园建设、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土地整治+”等政策实践创新,探索推进大都市特色土地整治的五个转变,即整治对象由以农地为主向以建设用地为主转变、整治方向由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转变、整治目标由耕地保护向城乡生态空间发展转变、整治范畴由单一项目实施向区域综合整治转变、整治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原有土地整治思路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一,整治空间从大都市区向大都市圈转变。

当今世界,公认有三个具规模效应的大湾区:一个是以金融为特征的纽约湾区,一个是以科技为特征的旧金山湾区,一个是以产业为特征的东京湾区。伴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中国国家层面上就形成了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这三个层级最高的大都市群。

其中,又可分成不同的大都市圈,如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等。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相关重点都市圈里,未来的发展趋势都是破除行政壁垒,促进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优化,进而提高整个区域的规模竞争优势。

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在符合土地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增减挂钩是推进工业用地减量化、农民集中居住、郊野公园建设的核心政策工具。原来的政策设计与上海市区级指标调剂限制范围,现在允许在都市圈范围内调剂指标,将对上海现行土地整治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大背景下,都市圈内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土地整治政策如何对接?不同城市的土地整治政策能否相互吸收、借鉴并发展成为具有显著特色的大都市圈土地整治创新政策?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整治对象从土地资源向国土资源转变。

早在2011年编制“十二五”土地整治规划时,上海就率先提出全域综合整治的战略设想,在“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尤其是郊野公园项目实施过程中,也逐级形成了大都市特色的“田水路林村厂”综合整治体系。随着国家自然资源管理思路的变化,即以资源要素分类部门管理模式转向更强调把资源要素看作具有内在联系的生态系统统一管理模式,整治对象将进一步从“田水路林村厂”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转变。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这种转变可能会催生一些新的国土空间整治类型。比如,淀山湖水源地生态修复,既是涉及“水林田湖草”的国土资源系统整治,需要相关部门的协作治理,又是涉及上海、浙江和江苏不同行政区域的整治,需要跨区域、多部门的国土空间综合治理。

第三,产权主体从二元分向城乡统一转变。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资源的自由流动不可或缺。为此,需要进一步打破城乡分立的二元土地市场,激活存量巨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权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的规定,并明确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在这33个试点中,长三角区域有4个,其中一个在上海松江,还有一个在浙江德清。

两地作了积极探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比如,德清通过“一村一梳理、一地一梳理”,摸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存量底数。这与上海的“一村一册、一地一册”相似。又如,德清试点分成就地入市和异地调整入市两种渠道。其中的异地调整入市在本质上和上海减量化指标调剂出让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村集体产权主体地位,把收益直接给村集体,后者则是成本和收益都是区镇政府在负担,村集体获得补偿。

上海的减量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成本等问题。这就带来一个思考:长三角区域城市建立城乡统一产权市场是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未来上海土地整治政策能不能在产权制度改革大趋势下实现自我优化?

第四,治理模式从政府主导向社区自主转变。

土地整治与空间治理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门、中介组织、专家学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社区和居民。

比如,上海的郊野公园项目是一类非常成功的整治项目。笔者在向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的学者介绍上海郊野公园时,这些专家最关注的是社区和居民怎么参与这个项目?他们为什么愿意参与这个项目?国际经验表明,社区自主和居民参与能够很好地降低土地整治行政成本,这应当成为上海土地整治政策的发展趋势之一。

第五,支持技术从地理信息向大数据转变。

土地整治规划和管理较早地应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大数据,现在需要进一步重视与相关的大数据。比如,有学者利用手机数据、通勤数据等重新划分长三角区域的“实体城市”,直观表现出区域一体化中的城市差异。大数据对土地整治的影响主要是技术方面。比如,利用大数据来分析郊野公园的吸引力及覆盖范围,是只有本区的人使用,还是全市的人使用?能否吸引周边城市的人?再如,在土地整治规划、土地整治潜力评估的过程中,人口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以往,我们多是通过镇村调查和农户抽样来测算乡村现在到底有多少常住人口,分析土地整治减量化的潜力有多大。这种方法的误差比较大,通过大数据则可以较好地提供有效验证。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我们党成立以来,不为错误观点所迷惑,不为利益干扰所左右,不为艰难险阻所吓倒,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遵循历史前进的逻辑,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紧贴实践创新的脉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蕴含了丰富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宣言书和行动指南。

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还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升华。

时代先锋 民族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新时代,全党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才能永不懈怠、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才能始终成为引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党领导人民

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据统计,自1921年7月中共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仅中共党员就约有370万人在革命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均下来每天有370名共产党员牺牲。历史和现实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不移,勇于担当、永久奋斗,不断传承、弘扬和践行伟大爱国精神,带领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才能在古老的大地上奏响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青春之歌,才为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人民,人民在我们党的旗帜上重如泰山。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解放作为奋斗目标,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标题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推出一项项改革举措,其本质都体现了我们党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权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执政理念,激荡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时代旋律。

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

回望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党的思想解放史、一部党的思想觉醒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经艰辛而又不断守正出新,深刻折射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实践突破”的逻辑和规律。

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提出科学区分、具体分析两种时代环境即“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我们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要求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但重心首先是放在中国实践上。

■ 徐九渊

打破文明发展“单一模式论”

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势应势、推陈出新。

这四个重要主张将“交流互鉴”的文明思想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深刻揭示出文明成长的内在发展逻辑。

首先,文明发展不是零和博弈。文明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不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状态。文化或文明不会因为消耗而减损。分享的人越多,产生的价值越大。

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中文版序中说:“中国的软实力增长很有潜力。中国的软实力上高于己、于世界都有益处。软实力竞争不必是场零和博弈,无须拼出个你赢我输。假如中美两国各自觉得对方日益有魅力,那么双方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假如中国的软实力上升会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就不失为实现中美正和关系的一种办法。”

不幸的是,当今世界文明差异引起的冲突依然存在。要消除隔膜和偏见,减少冲突,恰恰需要文明之间的深入交流、理解和融合,要用“和而不同”替代零和博弈。深入的交流赋予理性、开放、和谐、自觉和创造力,目标不仅是文明的自我理解与欣赏,而是要学会宽容和接纳多元理念。

其次,文明发展不是静态过程。文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发展不仅要守护传统,更要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

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走进不同的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中华文明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包容力和延续性。

再次,文明发展不是单一标准。文明不是抽象地、单调地发展起来的。如果以某一个文明的特点作为全人类文明的统一标准,甚至以此来无理评判、肆意改造,不仅会损害其他文明,而且会加深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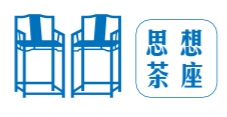
各个文明都是种族、民族、历史、地理、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不同的特点就是不同的基因,这个文明基因库就是人类应对未来的生存保障与发展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倡导交流互鉴就是打破文明发展“单一模式优越论”的有力思想武器。

最后,文明发展不是简单重复。文明的发展不应是低水平下的徘徊不前,而是追求由量变到质变的多样丰富。

本质上,具有多样性特点的各大文明也拥有内在的统一性,那就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由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文明发展的共同动力。

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就是要创造更高阶段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新文明不但具有强大的科技生产力基础,而且将吸纳古今未来一切文明的优点、长处,并为人类所有现存文明建立一套平等、独立、互信及和谐发展的全新制度,从而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多彩、平等和包容。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开启中国学术研究原创时代

■ 方松华

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其中,加强理论创新、提升学术原创力是一个重要内容。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和学派蜂拥而起。这是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不同、方法各异,但对天地宇宙、自然人生、人性善恶、治国方略等都有研究和讨论。特别是,某个学派的基本信念、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常常可以汇聚数千门客,从而形成一个传统。

先秦以后,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直到清代朴学。这是中国学术的历史传承与命脉所在,并曾经深刻影响亚洲乃至欧洲的文明发展、文艺复兴。不过,当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如日中天、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之际,中国学者却只在古籍中寻找章句、考证校勘。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不仅“范围太狭”,限制了学者的聪明

才力,而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实在是效率低下、浪费资源。

清代朴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造力的丧失。大量注经活动尽管使得清代学术日益精微,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开放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冯友兰先生的评价很直白:“清朝人的思想只限于对宋明儒学作批评或修正。但他们的修正,都是使其更不近于高明。”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科门类齐全,研究队伍宏大的科研教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学科设置主要以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等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根据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潮流和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建设起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准和创新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学科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目前,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达20多种,二级学科有400多种。与之相对应的是,

涌现出一批具有知名度的学术大家。他们树立的学术风范,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新的阶段。

但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研究能力依然有待提高。特别是,一些学者过于注重学术的功用,整天忙着做课题、发论文,而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文明传承的根本精神。

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紧迫感,要尽快告别模仿、开启原创。

在此进程中,积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三种资源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建设“五个中心”需优化产业匹配

■ 孔令丞 谢家平

在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过程中,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容;贸易中心主要涉及高端商务服务业;科创中心瞄准的是代表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产业,在价值链分布上向研发、行销两端攀升。这四个中心建设,为经济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其中,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科创板注册制设立和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三项重大任务”的深化与推进,对“五个中心”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五个中心”建设促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这本身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但从上海城市产业的空间布局来看,有些布局并不符合产业增值强度与城市空间价值“锚定”的正效应。这导致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与“五个中心”建设的匹配性较差。例如,副中心的产业特色不突出、互补性不强,多个副中心与市中心的分工合作不充分,产业功能与服务功能匹配性不足,“小镇”式产业发展与城市宜居的共存性功能较差,等等。这一空间布局问题,还严重制约了上海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那么,如何构建“锚定”正反馈效应的空间布局呢?

一是积极开展与“五个中心”建设相匹配的研究。

如果只有空间价值补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锚定”正效应,还不足以保障上海产业转型升级与“五个中心”建设具有匹配性。因此,有必要在现有产业布局合理评估的基础上,增加符合“五个中心”建设要求的产业内容和价值链环节,聚焦“战略优势+辐射扩散+虚拟功能”方面的增值强度等。

二是积极开展价值链升级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就制造而言,由于这些环节的虚拟功能相对较少、增值强度相对较低,因而在借助智能化改造提高增值强度的基础上,可以积极布局外围空间。

就行销而言,大量贸易、专业商务服务处于虚拟成分较高、辐射能力较强、增值强度较高的环节,可考虑在副中心布局和拓展业务。

三是积极开展“中心—外围、中心—中心、外围—外围”的空间布局优化效应研究。

鉴于大都市的空间与经济格局,实际上不可能形成单一的“中心—外围”格局,而要积极打造主价值辐射区的中心和副价值辐射区的副中心,以及更广泛的、相互联结的网络空间结构。

其中,主中心的发展重点是效率最高、虚拟成分最高、辐射最强、增值强度最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之后是科创中心、商务中心、航运中心、票据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展览中心等分工各异的副中心,外围可主要布局高端制造业。

上海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大都市,空间体量并不算小,在下一步的“五个中心”建设中,有必要科学细化中心与外围、中心与副中心、副中心之间、副中心与外围的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同时,从宜居性出发,应该改善和提升新城模式、特色小镇模式的功能与布局。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